

知微见义显新知

——评杨正先的《〈安娜·卡列宁娜〉研究》

代云红

读杨正先先生的新著《安娜·卡列宁娜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9月),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知微见义显新知”。所谓“知微见义显新知”,就是从一些不起眼的、容易被人忽略的细微现象着眼,通过对照发掘,阐释其“微言大义”,由此获得对作家整个创作过程或其作品整体轮廓的把握以及思想意蕴的深刻洞见,并且在前人有争议的问题上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知微见义显新知”反映了杨正先先生在学术研究上的问题意识与研究特点。正如加拿大文艺理论家诺斯洛普·弗莱说的:“每一细节或事件都向我们展现某个潜藏的整体,细节既掩盖又揭示这个统一体。”由此来说,抓住了细节就在某种程度上找到了解释整体的钥匙。

我们这里试以杨先生对《安娜·卡列宁娜》创作过程的研究为例解释一下这种研究的特性。

杨先生对《安娜·卡列宁娜》创作过程的研究是耐人寻味的。其一,杨先生在梳理托尔斯泰研究资料后注意到,普希金的未完成的一个文艺片段《客人们聚集在别墅》的开头影响了《安娜·卡列宁娜》的开头。《客人们聚集在别墅》第一句话是“客人来到了乡居”,在《安娜·卡列宁娜》里的第一句话是“奥布浪斯基家里一切都乱了”。杨先生指出《客人们聚集在别墅》开头的这句诺言“一下子就把人物投入了事件的中心”,而《安娜·卡列宁娜》开头那句话“一下子就把读者引向家庭,突出了小说的家庭的思想”,这就点出了二者的联系及差异。其二,杨先生指出,托尔斯泰突然对“家庭思想”感兴趣应引起我们的注意。杨先生解释说,之所以要注意这个问题,是因为托尔斯泰原来一直“沉浸在历史题材中,想以历史题材创作戏剧。”他为何突然会出现创作上的这种“转向”呢?通过对托尔斯泰创作心理的分析,杨先生最后指出,托尔斯泰在创作上的这种“转向”乃是源于他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关注,因为“不管托尔斯泰对历史何等的感兴趣,还是挡不住色彩斑斓的当代社会生活对他的诱惑。而社会中体现人们自然关系的重要单位是家庭。托尔斯泰想通过对家庭的剖析来反映现代人的生活。”

为了论证这一看法的可靠性与合理性,杨先生详细分析并比较了托尔斯泰在创作《安娜·卡列宁娜》时所拟定的6个提

纲的改动情况。其大致分析如下:在第一个提纲里还没有拟定标题,主题也比较单一,就是写“一个不忠实的妻子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全部悲剧”,简言之,小说还没有突破私生活的性质。第二个提纲确立了一个标题——《懦弱的好汉》,还确定了后来定稿中的几个人名,如卡列宁、安娜斯塔西娅等。事件进程的处理也更符合逻辑。“在这个提纲里,孩子占一个重要地位。”在第三个提纲里,作品标题未定。它增添了后来定稿中的两个主要人物(列文和基蒂)和一个次要人物(弗龙斯基伯爵夫人)。第四个提纲确定了后来定稿中的标题《安娜·卡列宁娜》。第五个提纲与第四个提纲的标题一样,都是《安娜·卡列宁娜》,但增加了一个题词。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五个提纲中,由一个新人物——奥尔德采夫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小说创作的方向——即对当时重大社会问题的探索。在第六个提纲里,小说的情节越出了家庭的范围而扩大到社会集团的广阔领域中去。杨先生说:“以上就是《安娜·卡列宁娜》创作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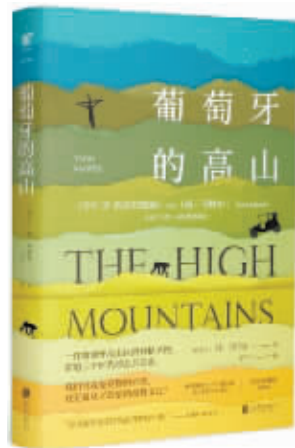
杨先生对《安娜·卡列宁娜》创作过程的比较分析,一方面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托尔斯泰在创作《安娜·卡列宁娜》时的心理变化过程,另一方面有助于我们理解作品的思想意蕴、艺术表现方式及特色。我们注意到,正是通过层层剥笋式的思考,杨先生指出《安娜·卡列宁娜》既是一部家庭小说、社会小说、心理小说,更是一部俄国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说《安娜·卡列宁娜》是家庭小说,是因为小说叙事是以家庭为中心的。小说写了如下几组家庭的情况:(1)合法不合情的家庭,如安娜和卡列宁组合的家庭;(2)合情不合法的家庭,如安娜和弗龙斯基组合的家庭;(3)合情又合法的家庭,如基蒂和列文组合的家庭。说《安娜·卡列宁娜》是社会小说,是因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随着社会的变迁,家庭的观念与伦理也会发生变化。在新旧更替时期,这种变化更为明显;同样,家庭的变化也折射了社会的变化。”说《安娜·卡列宁娜》是心理小说,是因为杨先生深谙文学是人学的道理。也就是说,文学创作的核心内容是关注人的生命活动,描写人的心理、情感与思想等,探索人的灵魂,反思人的思想与行为。简言之,文学是一种心灵

学,是一种生命符号学。事实上,托尔斯泰对此有很明确的认识。托尔斯泰说:“艺术的主要目的就在于表现和揭示人的灵魂的真实性,揭露用平凡的语言不能说出的人心的秘密。因此才有艺术。艺术好比显微镜,艺术家拿了它对准自己心灵的秘密并进而把那些人人莫不皆然的秘密搬出来示众。”杨先生于此是心领神会的。我们注意到:在杨先生的《安娜·卡列宁娜》的研究中,人物形象研究占有相当的分量。如第三章《〈安娜·卡列宁娜〉的形象体系》、第五章《〈安娜·卡列宁娜〉比较研究》等。杨先生在人物形象研究方面,既研究了人们熟悉的小说人物,还研究了被人们忽略了的次要人物,除此之外,他还比较了一些小说人物与其他文化地域中的人物形象的异同。不仅如此,在第五章《安娜·卡列宁娜》异彩纷呈的艺术》里,杨先生还系统研究了小说人物的心理以及心理表现形式。杨先生为何如此关注人物问题呢?这是因为人物一方面起到了联结和解释家庭与社会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人物也是理解托尔斯泰思想的一把钥匙。家庭、社会因人的活动而具有了一种内在的联系,它们是密不可分的。正是在此研究基础上,杨先生最后指出《安娜·卡列宁娜》表现了三种思想:家庭的思想,社会的思想和人民的思想。

杨正先先生新著《〈安娜·卡列宁娜〉研究》之所以能够做到“知微见义显新知”,在我看来,主要得益于他在三个方面的努力。一是杨先生持之以恒的学术研究,二是对中外托尔斯泰研究资料的占有程度,三是自觉的问题意识。杨先生长期致力于外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尤其在列夫·托尔斯泰研究方面成绩突出。2008年他出版了个人的第一部托尔斯泰专著《托尔斯泰研究》,2010年他出版了个人的第二部托尔斯泰专著《托尔斯泰散论》。这两部专著的出版,为其《〈安娜·卡列宁娜〉研究》奠定了比较扎实的学术基础,也在某种意义上开启了杨先生研究《安娜·卡列宁娜》的先河。

在不起眼的或细微的现象中发现问题,在对照中见差异,在差异中见思考,在思考中见智慧,这就是杨先生新著《〈安娜·卡列宁娜〉研究》的学术魅力,同时也是杨先生新著《〈安娜·卡列宁娜〉研究》带给我们的启示及思考。

新书速递



在《少年Pi的奇幻漂流》和《葡萄牙的高山》这两部相隔十五年的作品中,马特尔都以动物形象承载他形而上的隐喻。在《葡萄牙的高山》中,马特尔将爱比喻为一间“有很多很多房间的房子”。他坦言,在这本书中,他希望探索“人生的苦难会如何影响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联系”。本书融合了魔幻现实主义和童话寓言的写作手法,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每一位读者:“人最大的痛苦,来自无法接受命运的无常,以及生而为人的脆弱。”



《天鼓:从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是一部吸纳了最新学术研究成果的历史随笔集。作者以他擅长的聊天语气,从军事、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等多种角度,全方位勾勒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期间的历史风云变幻,剖析晚清国运堕入危局的深层历史原因,同时也揭开了众多历史人物的旧脸谱,描绘出他们的真面目,并对暗藏于历史深处的“荒诞性”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 本报综合

书业动态



《朗读者》出书了 董卿主编

《朗读者》出书了,这一次,《朗读者》图书首次尝试使用主持人董卿转身为主编董卿。《朗读者》共分三辑。以节目为基础,增加文学含量,提升阅读品质。全书共收录七十位朗读者的访谈、九十四篇文本、一百五十四张照片。访谈部分,补充了因节目时长限制而被剪辑的精彩片段;文本部分,进行了内容扩充、版本甄别、名家译本的替换;增加了朗读者小传和名家文本点评。《朗读者》图书首次尝试使用AR技术,读者只要下载“朗读者AR”客户端,扫描书中的任何一张图片,即可让静态的图文变成一部“可移动的活电视”,观看近1000分钟的视频片段。《朗读者》图书的总策划之一、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肖丽媛在台上介绍出版的幕后,未及多言,便已哽咽。72天,20多人的编辑团队在和时间的赛跑。 本报综合